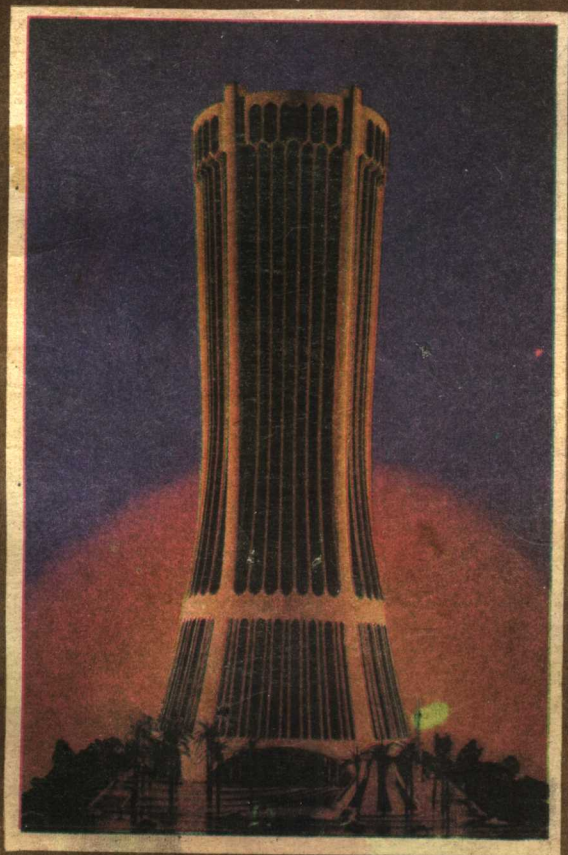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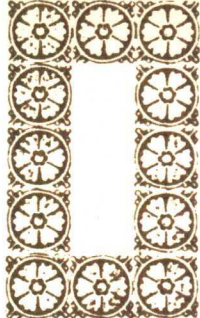




西方世界的 兴起

〔美〕道格拉斯·诺思等著
张炳九译





张炳九 译

西方世界的兴起

〔美〕道格拉斯·C·诺斯

罗伯特·保尔·托马斯 著

西方世界的兴起

道格拉斯·C·诺思
〔美〕 罗伯特·保尔·托玛斯 著

张炳九 译

学苑出版社

(北京西四颁赏胡同4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唐山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7.60 字数160千字

1988年11月第一版 1988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0册

ISBN7-80060-205-2/C·4 定价2.85元

出版前言

当中华民族再次叩开通向现代化的大门时，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理解现代化本身。

现代化的浪潮起始于英伦三岛，进而波及整个世界。西方世界率先跨入了现代化的行列，并且在二十世纪的后半叶把人类文明带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在西方文明的冲击和影响下，现代化成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众多民族追求的方向。无论是先现代化的国家还是后现代化的民族，都为人类留下了现代化的宝贵经验和沉痛教训。

毫无疑问，在现代化征程上迈进的中国人，不能不回顾并反思人类在现代化道路上走过的旅程。

为此，我们编辑了这套丛书，向读者介绍世界著名学者对现代化的研究心得。丛书所选，以现代化理论、政治发展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名家名作为主，兼收有关西方世界发展史的著作。

愿这套丛书为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尽微薄之力。这是我们的真诚愿望，也应该成为编者和读者的共同目标。

“比较现代化丛书”编委会

1988年秋

中译本序

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起以至于70年代初期，在美国兴起过一场经济史学革命，形成了一个所谓新经济史学派（亦称历史计量学派）。本书的两位著者——诺思和托玛斯——都是这个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史学观点和方法上，历史计量学派的主要特点是：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对不同社会历史上的经济成败及其缘由作数量的分析研究。他们认为经济史研究不止是搜集、考订、分析史料和叙述史实，更重要的是要能解释史实，说明其中彼此的相互关系。

在兴起以来的30年中，历史计量学派的国际影响已经有了扩大，但它们的主要研究领域和已有成就，大概还是限于美国经济史上历时较短（几十年以至百年）的问题。现在张炳九同志译出的这本《西方世界的兴起》是这派学者的第一部论述西欧上下近千年历史的著作。书的篇幅不大，作者们在里面没有提出任何新的具体问题的数量研究成果，而只是对于西欧从中世纪后期到英国产业革命开始时期之间的历史，对于西欧所以先于世界其他地区，英国又所以先于西欧其它民族国家发生产业革命和

经济增长的原因提出一些看法，或者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提出了“一个用以考察和说明西方世界兴起的全面的分析框架”（作者自序）。作者们一再声称全书是史论而不是详尽细致的经济史研究。

诺思和托玛斯认为18世纪以后西欧所以首先出现经济增长的局面，社会总收入所以会有比人口更迅速的增长，原因在于当地具有成效卓著的经济组织能对私人财产保障安全，因而促进了一般人的好利心理；而西欧这种比较完善的经济组织是中世纪以来将近一千年间长期演变的结果。在这长期演变过程中，起关键性作用的是两个外部因素：（1）人口增长；（2）人的独立和自由。人口增长是在这一漫长历史时期内始终起积极作用的因素，民主和自由则是十六世纪专制王国形成以后起作用的因素。他们指出，过去多数学者都只看到人口增长的直接影响，以为在土地资源和生产技术不变条件下，人口增长在经过开始阶段的生产增长以后，必然要由于土地报酬递减律的作用，导致人均产量或收入的逐渐减少，以至造成灾歉、饥馑和瘟疫等一系列“马尔萨斯抑制”和人口普遍锐减的历史循环；而没有看到人口增长除了这种直接影响以外，还有另一方面的间接影响也很重要，这就是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垦殖地区的开拓，区域或国家之间的分工和贸易必然也有所发展，从而工商、金融、交通事业的生产率和社会人均收入也得到提高。西欧16

世纪以后并未出现如同13世纪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兴盛之后的各国普遍衰退，在荷兰和英国反而出现了全世界任何地区从未有过的经济增长，就是因为在这两个国家一方面人口增长的间接影响超过了直接影响；另一方面，这里的人享有其它国家国民所享受不到的民主自由权利，工商业者要比在西班牙、法国和欧洲其它地方更能抗拒当地政治、宗教或城市行会势力的压迫、垄断和横征暴敛，因而身家财产较有保障，也较能自由经营企业，使得这里的私人收益率较高，与社会收益率比较接近。

以上是《西方世界的兴起》全书的主要论点。其中本来还有如欧洲16~18世纪科学技术发明和国际能源分配是否也是影响国别经济发展的因素、人口因素能否完全不受一国政府政策和经济盛衰的影响、民主自由权利和私有财产制度本身是否也是社会经济关系发展的结果等问题应加讨论，可能由于两位作者是历史计量学家，矢志以西方新古典学派经济学治史，对于上列问题或者纳入成本—收益范畴（如技术发明问题作为维护专利权的成本—收益比较）处理，或者是视同外化，根本不去涉及。他们只是就历史事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明显相互关系立论，而不是要探索历史发展动力或事物之间的前后因果决定性关系。他们的主要论点都是从这样一个隐含的基本假设出发的，即是任何时代、任何人都只能按经济规律办事，在当时已有的技术经济条件

下，用最少量的人力物力去达到他所想要达到的目的。如果这是一个无可非议的假设，那么，我们也应当承认书中有关高效率经济组织、民主自由和私有制社会内私人身家财产的安全保障是经济增长必要条件的论点是正确的和具有普遍意义的。

经济史不止是一门知识性学科，它同时还是一种方法论，一种研究经济问题的工具。诺思和托玛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所用的方法和提出的论点，不仅可供我国经济史学者参考，而且对于一般关心改革和国家前途的人也可能是有用的。几十年来国内有关外国经济史的著译不多，西方不少经济史名著都还没有中译本，炳九同志现在把诺思和托玛斯的这本书译成中文出版，是做了一件好事，我们应当深表欢迎。

陈振汉

1987年9月，北京大学

前 言

本书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革命的，但在另一些方面却又很保守。说它是革命的，是因为在该书中我们提出了一种宏观分析的框架用以考察和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在这方面，它完全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准理论协调一致。为了使那些预先没有经济学训练的人都能读懂，也希望本书写得饶有趣味，我们尽量不用专业术语使之读起来清新明快。

说它是保守的，是因为我们推进了许多前辈学者早先的研究工作。本学科的专家们一眼就会看出，本书之成功得力于麦克·布洛赫，卡洛·西波拉，莫里斯·多布，约翰·U. 内夫，M. M. 波斯坦，约瑟夫·舒姆派特，自然还有从事古典法律和制度研究的波洛克及梅特兰和斯塔布。

应当强调，本书是一种阐释性的研究，是一种扩大了的说明确要，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史。这里既没有标准经济史的详尽无遗的研究，也不是对新经济史的精确而又实际的检验。其目的是为欧洲经济史的研究提出一种新的思路，而不是给他们提供什么标准模式。毋宁说它是进一步研究的一项计划。

需要特别感谢的是：同我们长期工作的同事，尤其是史

蒂文·切昂格在提出理论框架方面给予我们的帮助；马丁·沃尔夫把他关于法兰西财政史的即将问世的书稿借予我们；大卫·赫利希和 M.M. 波斯坦不吝时间阅读手稿，提出详尽的建议并对第一、二部分的初稿提出批评性意见；特里·安德逊和克莱德·里德在研究方面给予宝贵的帮助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还有，本书理论问题的初稿曾在若干大学做过演讲，感谢那里的无数听众。最后要说的是，虽然本书有价值的东西应当与众同享，但其缺陋自然由我们负责。

承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提供经济上的资助本书方能告成。对于基金会之经常的关心和帮助，我们谨志深厚谢忱。

向麦龙·英波娜致以特别的谢意，她以津津有味、富有文采的笔调把我们颠三倒四、拉拉杂杂的草稿改写一过，乔安娜·奥尔森也参与了此项工作。

为了保证本书的连贯性和易读性，我们在书后为每一章列出一个书目提要，并对直接引文和旁注加上简短的注脚。这样做未经有关学者同意，敬希垂谅。

原作者

目 录

中译本序

陈振汉

前言

第一部分 理论和概览

第一章 论 题 (1)

第二章 概 览 (12)

第二部分 公元900~1500年

第三章 土地所有权与人 (25)

第四章 中世纪早期终结时的经济条件 (33)

第五章 中世纪高段：拓边运动 (45)

第六章 13世纪的欧洲 (63)

第七章 14和15世纪的欧洲 (98)

第三部分 公元1500~1700年

第八章 财政政策 and 财产所有权 (125)

第九章 近代的早期 (140)

第十章 落伍者——法兰西和西班牙 (164)

第十一章 尼德兰和成功的经济增长 (181)

第十二章 英格兰 (200)

结 语 (214)

书目提要 (216)

第一章 论 题

西方人的富足是一种崭新而独特的现象。过去几个世纪中，他们摆脱了赤贫和饥馑所加的桎梏，发现把生活质量弄得好一些是完全可能的。本书的目的就是对这种历史性的成就，对西方世界的兴起给以说明。

本文的中心论点是很明确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增长的关键要素；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就在于发展了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

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建立制度化的设施，并确立财产权，把个人的经济努力不断引向一种社会性的活动，使个人的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①我们在后面将会提出一种与此相关的模式并对导致制度发生改变的参数变化做出说明。但我们首先必须非常简要地说明达到经济增长的各种基本条件，并对个人和社会在成本与收益方面的差别进行比较。

说到经济增长总是指个人平均收入的长期提高。因此，真正的经济增长总是意味着社会总收入的增加必须快于人口

^①个人收益率是经济单位从其所从事的活动中获得的纯收入量。社会收益率则是社会从同一种活动中获得的纯收益总量（正的或负的），它是个人收益率加上这种活动对社会其它成员所造成的最终的影响。原注

的增加。反之，增长速度为零就不能保证人均收入的持续提高，尽管在一个很长的周期之内平均收入可能提高或降低。

如果缺乏刺激因素激励社会成员参与推动经济增长的活动就会出现零度增长。因为个人可以不必那么积极上进，努力进取，而且在所有的社会里，人们都完全可以对他们的现状得意满；不过有时也有经验说明，大多数人喜欢更多地要点货物，并为此而采取行动。经济增长只需要某一部分居民具有进取心也就够了。

因此，我们要再次说明，如果一个社会经济不能增长，那一定是因为它不能激发起经济上的进取精神。让我们看看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先要把由于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投入的提高造成的那种收入增长独立出来。这种直接投入的增加导致全面（过度的）增长，但不一定提高每一个人的收入。人均收入的提高可以在两种情况下产生，我们把这两种情况叫做真正的经济增长。其一，人均生产要素的实际数量可能增加；其二，一个或几个生产要素的效益增加。这二者都可能导致增长。此种产出的增长可以通过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的实现而完成，这或是因为生产要素的质量得到提高（劳动者受到更好的教育、资本体现了一种新的技术），或是因为不稳定和信息费用造成的生产要素市场的缺陷得到纠正，或是组织方面的变化克服了市场的缺陷。

过去，大多数的经济历史学家认为西方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技术上的变化，欧洲经济史实际是以工业革命为中心的。近来，有一些经济史学家则强调人力资本是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最近，有些学者开始探讨市场信息费用降低对增长的影响。上述每一种因素无疑对产出的增长都会发生显著的影响。由于规模经济是以供应日益扩大的市场而进行的生

产为基础的，因而它对产出的增长也发生同样的影响。基于这些理由，再加上我们主要关心的是人均的增长，这样，人口的增加就成为决定“真正”经济增长的另外一个因素。

上面说到的这些表明，经济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在他们对过去经济实践的分析中，几乎一致地确认了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但这里明显地存在着一个漏洞。我们不禁要问：如果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只是投资和发明，那么，为什么有些国家既有投资也有发明却没有获得满意的结果呢？

看来，问题的答案会把我们引回本书的开端。我们所列出的那些因素（发明，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等）并非增长的原因，但却是增长。本书之中心就是要考察经济增长究竟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要是现存的经济组织没有效率，那么增长是不会轻易出现的。必须把社会成员鼓动起来，着魔似地去从事有益于社会的活动。必须创设某种机制让个人和社会的收益趋于一致，个人的收益与成本和个人参与某种经济交换息息相关。而社会的收益与成本则会对社会整体发生影响。收益或成本在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差别意味着第三方面或更多方面的存在。他们没有参与活动，也会获得一些收益或者付出点成本。此种差别不管在什么时候出现，所有权都是很不明确或很不牢靠的。如果个人的成本大于个人的收益，个人就不愿从事此项活动，即使这项活动对社会是有益的亦复如此。本书中讨论到的某些历史性的事件在每种情况下都与所有权相关。

以横渡大西洋和国际贸易来说，这方面发展的一项主要障碍在于航海者们没有能力测定船只的精确位置。这需要两种相互关联的知识，即纬度和经度的知识。测定纬度的办法是早已知道的，只需要测定北极星的地平纬度也就行了；但

南半球的纬度是落在地平线以下的。为了找出一种方法解决这个问题，葡萄牙亨利王子召集一批数学家，他们发明了一种测定太阳中天高度的方法，当太阳的中天高度与其倾斜平面重合时，就能提供此种高度的必要数据。但测定经度的方法则更为棘手，因为测定经度所需要的计时器要求精确地把横渡大西洋的时程表示出来。西班牙菲利普二世最初悬赏1000克朗（crown）^②征求这种计时器。荷兰把它提高到10万弗洛林^③，而英国最后则愿意拿1万至2万英镑的赏金，其精确数值视计时器之精确度而定。悬赏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最后约翰·哈里森得了奖。为解决这个问题他耗去了一生大半光阴。精确地测定航船位置是一项社会性收益，在降低航海贸易的成本方面，其价值无可计量。要是当时的发明者握有所有权以保证他们从船只和时间的节约中获得额外的收入，那么，这一项技术上的突破将会提早多少年实现呢？当然，他也要付出高昂的研究费用，也可能功本耗尽，一无结果。当时，为了鼓励数学家努力工作而提供的赏金和奖品都是随意决定的，但是，只有法律明文规定的、对新的设想、发明、创新等知识的专属所有权才能提供更为普遍的刺激因素。没有这种所有权，就不会有人为了社会的利益拿个人的财产去冒险。

至于所有权的实行方法，也可从横渡大西洋的例子中得到说明。在整整几个世纪中，海盗和私掠船四处出没，从贸易中大发其财，弄得人人愤恨。海盗的威胁提高了贸易成本并且缩小了贸易的范围。一种解决的办法是行贿。英国通过

② 克朗（crown） 英国银币名，值5先令。——译注

③ 弗洛林（florin） 金币名，1252年在佛罗伦萨铸造，后为英、法等国仿造，值2先令。——译注

这种公开行贿的方法，在很长时间内阻止了地中海北非海盗的蹂躏。行贿的方法是“有效”的，这是因为得自地中海自由贸易的收入大大地多于为使国家境况更佳而支付给海盗的贿金。结果，此种办法花的钱要比支付海军保护费用低得多。

在这段时间里，其它国家是用海军保护商船航行，还有一些国家则部署了分遣舰队。最后，通过海军的努力，所有权在国际范围内实行以后，海盗就从此消失了。

要说明的第三点是，近代早期西班牙的土地政策导致了对契约规定的所有权的不恰当对待。由于人口的不断增长，土地变得稀缺了。用于提高农业效率的社会收益率提高了，但个人收益却得不到提高，这是因为王室以前已经把穿过西班牙放牧羊群的专属所有权授与了牧羊者行会（即迈斯达）。那些精心操持、种植庄稼的土地所有者时时刻刻担心着庄稼会被路过的羊群吃光或糟蹋。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名义上的土地所有者对这些土地并不具有专属所有权。

对于那些认真的读者来说，这些说明可能会产生出更多的问题来。社会为什么不更早一点实行对知识财产的所有权呢？为什么助长海盗势力的发展？西班牙国王为什么不取消迈斯达的特权，不实行无条件继承不动产的方法解决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呢？

对第一个问题，可能有两个答案。也许是因为拿不出什么办法使每个船主从其海上安全保障的提高所得到的收益中拿出一部分付给发明者（这是“技术性”限制）。也许是因为那时征收这种付费所花的钱超过了预期会从发明中获得的报酬。

对第二个问题回答是，从根本上说行贿要比海盗行为好，因为国家在拿出贿金后甚至还赚了钱。可以说护航通常

也是个好点的办法，但随着贸易的扩大，后来就清楚地发现，要用护航来完全铲除海盗是个花费高昂的办法。

第三个问题。西班牙国王的收入很大的一个部分是从迈斯达获得的。要是取消迈斯达的特权，难说国王还能不能得到这笔收入。尽管取消他们的特权后社会的收入可能增加，但国王得自土地税的收入则可能会因用于变更所有权和征税的费用而降低，即使不是这样，其费用从短期来看至少也是与平常得自迈斯达的收入一样多。那些陷入困境之中的土地所有者是否也能照着英国人那样贿赂那些放牧的人不从他们的土地上经过呢？这里的困难在于经济学上所谓“沾光者”

(free-rider) 问题。把所有的土地所有者都动员起来去行贿所花的费用，可能会比从行贿中取得的报酬要大得多，因为每一个土地所有者都尽量逃避拿出贿金，又总是希望能从所有其它人交付贿金换得的好处中捞到一份好处。

从历史上看，我们就发现两个普遍的原因，说明为什么所有权并没能让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相等。

(1) 当时缺少一种技术手段能消除那些沾光者造成的影响，或者强迫他们分担一部分交易费用。比如，为保护那些陆路贸易商免受隐匿在沿途城堡里的领主的伤害所支付的贿金或交纳路税本来要比绕道而行要来得便宜。但由于发明了机关枪和大炮最后使得这些城垒难以防守从而使得实现所有权的费用降低。直到现在，在思想、发明和创新以及在象空气和水这样的自然资源方面发展和实行所有权，由于各种技术问题同样很困难，因此也就很费钱。为了使个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在不同时期已经制定了在秘密、酬金、奖励、版权和专利方面的法律，但防止局外人受益的技术迄今还是费用高昂，措施不当。